

《剪灯新话》与《金鳌新话》叙事比较研究

李 涛**

〈目次〉

- | | |
|--------------------------------|--------------------------------|
| I. 引言 | IV. 《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
叙事差异形成的原因 |
| II. 《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
叙事结构的对比分析 | V. 结论 |
| III. 《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
叙事文本的对话性 | |

I. 引言

《剪灯新话》是明代瞿佑所著的传奇小说集，在当时极受读者喜爱，并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在其影响下产生了一批模仿之作，这其中就包括朝鲜时期著名作家金时习所作的《金鳌新话》。尽管两部小说集都没能达到传奇小说的最高水平，但在各自国家古典小说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前者是从唐传奇到《聊斋志异》的桥梁¹⁾，后者是朝鲜汉文小说的奠基之作²⁾，对后世朝鲜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³⁾。

* 岭南大学校 中国语言文化学科 博士课程生

- 1) 《剪灯新话》和仿效它的《剪灯余话》这两部传奇小说集的出现，是文言小说复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从唐人传奇到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桥梁。(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697页)
- 2) 金英今编著，《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67页。
- 3) 《金鳌新话》对后世韩国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金鳌新话》各篇的标题成为后世韩国小说标题的原型。第二，《金鳌新话》为后世韩国的艳情小说提供

对于一部小说而言，叙事是其核心。事实上，《剪灯新话》之所以成为唐传奇与《聊斋志异》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传奇叙事笔法中，融入了话本叙事元素，正是叙事方式的交融所产生的新变为后世形成全新的叙事面貌奠定了基础。而对于《金鳌新话》来说，在继承《新罗殊异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形成的史传叙事传统基础上，借鉴《剪灯新话》传奇叙事笔法，形成熔铸传奇与史传于一体的叙事特征，则是其深刻影响后世汉文小说发展的关键，也由此奠定了后世小说的创作基础。因此，虽然古典小说中的叙事往往是模式化、单一化的，但是仍然需要从宏观角度对这些小说的叙事方式加以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够清晰地把握不同文化环境中小说叙事的独特传统，为当前的小说批评打下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对《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的比较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上，以及二者在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创作手法等方面的异同，韩国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与此类似。而关于两部小说集的叙事研究，在大陆有期刊论文《剪灯新话》的结构阐释(2000)，学位论文《剪灯三话》叙事研究(2012)等，在韩国也有期刊论文《金鳌新话》에 나타난 宗教성과 叙述技法：传奇小说 글쓰기의 特性立场에서(2014)、‘冤鬼’와 《金鳌新話》조선 초 冤魂叙事的 형성(2012)、《금오신화》의 세 여성과 서사적 특징(2011)，以及学位论文《금오신화》의 서사방식 연구(2013)、《金鳌新話》의 서사방식 연구(2001)等。而对二者进行系统叙事比较研究的论文，则多是在进行综合比较时涉及到叙事方式的比较，主要有《剪灯新话》与《金鳌新话》的比较研究(2013中)、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研究——兼与《金鳌新话》比较(2004中)、《剪灯新话》和《金

了写作模式，这类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才子佳人，男女双方的相爱方式都是一见钟情式，双方对爱情执着，这样的关系符合古代韩国人民的爱情理想。第三，鬼神怪异描写成了韩国小说的传统，这影响下出现了大批极富浪漫精神的小说和戏曲。第四，《金鳌新话》也是最初的梦幻小说，梦境、幻境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描写和夸饰，可以藉以抒发在现实中不得实现的理想，在以后的韩国小说发展中，这种借梦境、幻境抒发理想的作品就续出不穷了。(金政六，〈《金鳌新话》和《剪灯新话》比较考〉，《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23页)

鳌新话》中爱情悲剧小说比较研究(2015韩)这三篇学位论文。

上述关于两部小说集的叙事研究中,已经涉及到的话题包括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和模式等内容,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具体比较两部小说的叙事特征、并将其纳入小说发展史探究其叙事传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文拟从两部小说集的文本出发,在详细分析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出两部小说集叙事结构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两部小说集的篇目之间构成一种对立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则进一步凸显出《剪灯新话》传奇叙事的通俗化趋势和《金鳌新话》传奇叙事的史传化特色,最后对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做了初步的探讨。

II. 《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叙事结构的对比分析

《金鳌新话》包括五篇小说,即:《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醉游浮碧亭记》《南炎浮州志》《龙宫赴宴录》。由于这五篇小说主要受到了《剪灯新话》中《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渭塘奇遇记》《鉴湖夜泛记》《令狐生冥梦录》《水宫庆会录》的影响,本文拟主要以这些篇目做比较,分析两部传奇小说集的异同⁴⁾。

4) 关于《金鳌新话》受到《剪灯新话》中哪些作品的影响这个问题,先贤学人有过较多讨论。金台俊认为《万福寺樗蒲记》与《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富贵发迹司志》、《李生窥墙传》与《渭塘奇遇记》、《醉游浮碧亭记》与《鉴湖夜泛记》、《南炎浮州志》与《令狐生冥梦录》《太虚司法传》、《龙宫赴宴录》与《水宫庆会录》《龙堂灵会录》之间“似气脉想通”。张哲俊也认为二者之间不是单纯的一对一关系,《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醉游浮碧亭记》《南炎浮州志》《龙宫赴宴录》主要受到了《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渭塘奇遇记》《鉴湖夜泛记》《令狐生冥梦录》《水宫庆会录》的影响,同时《万福寺樗蒲记》与《牡丹灯记》《绿衣人传》《爱卿传》《富贵发迹司志》、《李生窥墙传》与《金凤钗记》《翠翠传》《秋香亭记》、《南炎浮州志》与《太虚司法传》、《龙宫赴宴录》与《龙塘灵会录》之间也存在接受关系。为便于行文,本文采用张哲俊的说法,以《万福寺樗蒲记》与《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李生窥墙传》与《渭塘奇遇记》、《醉游浮碧亭记》与《鉴湖夜泛记》、《南炎浮州志》与《令狐生冥梦录》、《龙宫赴宴录》与《水宫庆会录》这五组存在主要接受关系

《剪灯新话》			《金鳌新话》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背景	延佑年间，永嘉书生滕穆侨居临安备考	《万福寺楞蒲记》	背景	南原梁生独居万福寺，有神语之将得好述
	经过	聚景园		万福寺	梁生与佛斗蒲戏胜，请赐美女
				开宁洞	藏于几下，遇佳人，欢会
					同赴开宁洞，三日(三年)而别，四邻赠诗
	永嘉	女同生归家，得众欢心三年，再赴临安应试		宝莲寺	女赠银碗，约与生同謁父母
	聚景园	旦，赴坟前探视		开宁寺	见女父母，知女身世
生再见女，与女分别					
结局	生无心功名，入雁荡山	结局	祭祀女坟前		
《渭塘奇遇记》	背景	至顺中，金陵士族王生，以奇俊称之	《李生窥墙传》	背景	松都有李生，风韵清迈；善竹里有崔氏女，态度艳丽
	经过	渭塘		崔家	李生诣学归来窥见墙内崔氏，以诗挑之
				李家	晚，李崔约会于闺阁
				李家	李生被谪送蔚州
	渭塘	收租归来，酒肆饮酒，遇肆主之女，眉目传情是夜，于舟中梦入闺阁		崔家	崔氏病倒，崔父始获知其心事
				李家	崔父遣媒人三往李家，婚姻遂成
				穷崖	逢红贼，藏于穷崖
	结局	金金陵		夜夜梦之，赋会真诗	崔家
崔家			贼灭，李生返崔家旧地，夜遇崔氏亡魂，一诉别后		
崔家			三年而复别		
结局	终以偕老可谓奇遇矣	结局	李生思念成疾，卒闻者慕其义		

的小说作为比较素材。

《鉴湖夜泛记》	背景	成令言，不求闻达，素爱会稽山水		《醉游浮碧亭记》	背景	平壤古朝鲜国，胜地颇多，永明寺浮碧亭其一也			
		天历年，卜居鉴湖之滨，泛舟江湖				天顺初，松京富室洪生，才貌双全			
	经过	鉴湖	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观下，忽至银河		经过	浮碧亭	中秋，醉游浮碧亭，触景生情，赋诗而舞		
		银河	织女邀其至灵光之阁，请代为传言，以止流言而正视听				三更，箕氏女出，相与言诗		
			织女赠锦而遣返之				箕氏女叙其身世		
	人间	出织女所赠之锦，验之于胡商，果非凡品			松京	生病归家，梦箕氏女告曰将为仙人			
结局	轻舟短楫，长游不返		结局	生果于九月望日逝					
	二十年后，有人遇之，己为仙人			数日颜色不变，人以为遇仙尸解					
《令狐生冥梦录》	背景	令狐撰者，刚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灵		《南炎浮州志》	背景	成化初，庆州朴生，淳愿醇厚，习儒业，疑浮屠巫覡之说			
		邻居乌老，贪婪不义，卒后复苏，以钱贿阴司也。撰作诗讽之				生曾著一理论，以自警			
	经过	地府	是夜家中独坐，鬼使拘到地府		经过	南炎浮州	家中夜寐，忽至海岛，不似寻常地方		
			阎王欲治其罪，生作文辩之				入王城，与王论道，复论人间政事		
	阎王复拘乌老，生游地府		王将禅位于生，并嘱生要传正道于人间，以去荒唐						
结局	旦，扣乌老之门，知其是夜逝矣		结局	生数月而逝					
				生逝前梦神人告于四邻，其将为阎罗王					

《水宫庆会录》	背景		《龙宫赴宴录》	背景	松都天磨山，有龙湫曰瓢渊，景胜而有灵	
					前朝韩生，能文	
	经过	人间		至正甲申岁，潮州士人余善文，于家中闲坐，忽有二力士至，请其赴广利王龙宫	人间	韩生于家中坐，龙神使者请其赴龙宫
		龙宫		广利王迎生入龙宫，请其作上梁文 文成，请三海龙王同来赴会，共观歌舞	龙宫	龙王迎生入水晶宫，请其作上梁文 文成，请生观歌舞，龙王吹笛献词，复请生观伎戏 生游览龙宫
		人间		生还家后，卖广利王所赠宝物，遂为富族	人间	生返家后，藏龙王所赠宝物
结局	后弃家修道，游名山，不知所终	结局	不以名为怀，入名山，不知所终 ⁵⁾			

通过对比分析这些故事的叙事结构可以发现，《金鳌新话》是标准的传记体结构，开头即简述故事、人物背景，中间讲述人物传奇故事，结尾说明人物的结局。而《剪灯新话》中有史传体结构，亦有直接进入故事及故事结束便戛然而止的结构，如《水宫庆会录》就没有交代故事及人物背景，直接从力士至余善文家中请其赴广利王龙宫开始；而《令狐生冥梦录》则没有交代令狐生最终的结局，仅以令狐生在乌老贿赂阴司复生这件事情上的胜利而告终。这表明尽管金时习在瞿佑文本的影响下创作了《金鳌新话》，但其在再创作过程中，是严格按照传记体结构来写作的，这种选择可以反映出金时习对文体的敏感性，也可见出他对真实性的追求，因为史传体是一种求真的文字。而瞿佑在创作中，则不拘泥于传奇文体，融合了话本小说的结构模式，以故事完整性为主，于是其创作少了一些固定模式，多了一些灵活变

5) 该部分内容根据林明德主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三卷、七卷)和崔溶澈译注《剪灯三种》(上)整理。

化,可读性、娱乐性增强。

其次,《金鳌新话》的叙事结构比较《剪灯新话》而言,要相对更加丰富、多变一些,这也是唐传奇的“叙事婉转”的特点之一。而《剪灯新话》则要简单直接许多,大部分小说的结构都是以核心事件为主,不涉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一点最明显的是《万福寺樗蒲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以下简称《万福寺》《聚景园》),而《李生窥墙传》的情节更像是《涓塘奇遇记》和《翠翠传》的综合,所以不以为论据。在《万福寺》中,在开头便提到梁生树下作诗遣怀,遂得神谕,将得好谜,为故事设立悬念。然后讲到梁生与佛斗蒲戏胜,请求佛赐其美女,进一步吊起读者胃口。所以当生隐于几下等候美女时,读者也满怀期待地往下阅读。终于到何氏女登场了,何氏又作了一篇曲折婉转的自诉词,叙述了来历,表达了情怀,展示了才华。这之后梁生终于不能自己,出而相见。这一段相遇写得十分美好而神异,既有天意,也有人情。而《聚景园》中,瞿佑没有设置悬念,先是概述,交代了滕穆到临安应试、到处揽胜这一背景,然后单刀直入,直接写道滕穆晚上在聚景园遇到了美人卫芳华。这样一来那种一唱三叹的情致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直奔主题的直接,这应该是瞿佑为了市民阶层的接受习惯着想的,因为对于明代的市民阶层而言,那种充满文人情怀的相遇远不如一场令人羡慕的艳遇有吸引力。

第三,《金鳌新话》故事情节的设定和描写更为详尽,符合史传重视细节、凸显伦理的创作手法,而《剪灯新话》则重点在于娱乐性,涉及到伦理判断但影响故事流畅度的内容均略去。仍然以《万福寺》和《聚景园》为例,何氏与梁生在开宁洞居三日后,遣生持银椀往宝莲寺同见其父母。这一情节中,详细描述了梁生持椀等候何氏父母并知悉何氏身世、梁生和何氏一起与何氏父母共同进餐等事,其后何氏有一大段文字表述了自己为何明知有违礼法,却仍与梁生私下结缘的缘由。之所以有这么一段情节,应该是金时习觉得何氏与梁生一面之缘,既无媒妁之言,更无父母之命,私下结缘不符礼法,于是通过这一段情节让二人的结合更加符合礼法。但是又绝不是酸腐的礼教说教,而是源于何氏“风情一发,终不能戒”,可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可见金时习既不忘儒者之礼教,又兼顾人情之天性。而《聚景园》中也有类似内容,即卫芳华随滕穆返回家乡这一情节,但是除了滕穆骗大家说“娶于杭郡之良家”这一细节之外,其余皆以概述性文字,略述卫氏以贤德得众乡邻之心。这可以理解为瞿佑认为当时的读者对这一情节毫无兴趣,在当时读者看来,人物的离奇经历比他们的道德原则更加有意思。可见出瞿佑的这种叙述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讲述非常见的爱情奇遇故事以娱乐读者为目的。

其实,仔细分析文本,《剪灯新话》的通俗化,还表现在标题的话本化上,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是《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其基本符合主谓句式、七言结构的套路,与白话小说的题目或是回目已十分接近了⁶⁾。当然,《剪灯新话》中还有传记式题目,这说明瞿佑受到了影响,但是似乎这种影响是不自觉的,瞿佑自己没有意识到,不然瞿佑应该会让21篇小说的题目尽量统一一些。

通过关于《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结构情节的分析,笔者认为金时习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是积极使用传奇笔法,讲述了一系列结构曲折、瑰丽多姿的神怪故事;另一方面则通过人物生平完整性、情节的伦理教化性,更多的发挥了传奇小说求真求善的史笔作用,强化了其士大夫文学的一面,追求真实,教化人心,有所兴寄;而瞿佑在创作中,由于对市井平民受述者的考虑,使得其叙事主要在于讲述奇闻异事、风流艳遇,侧重点在尚奇求怪,以满足读者对神异故事的爱好,因此可以说更多地发挥了传奇小说的娱乐作用,表现了传奇小说通俗化的一面,以文为戏,展示才华。

III. 《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叙事文本的对话性

关于对话性,董小英是这样阐述的,“对话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交

6) 参见:马振方,〈论古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际活动最根本的方式,用巴赫金的话说:‘对话交际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如果我们把对话内容抽象出来,对话者之间就是‘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巴赫金称此为‘纯粹的对话关系’。如果不是在对白中,而是在独白陈述中,在人与人的意识的关系中,也出现这种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就叫作对话性。这不是在文本中以引号标志的明显的对话,而是一种‘在各种价值相等、意义平等的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而这种对话性是叙事艺术的生命之所在”⁷⁾。《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中,有两组小说较为特殊,一是《令狐生冥梦录》和《南炎浮州志》,一是《鉴湖夜泛记》和《醉游浮碧亭记》。两组文章不仅在情节上存在关联,而且在叙述话语层面也因为“同意和反对”而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

具体而言,《令狐生冥梦录》中,阎王则是因为令狐生作诗讽刺自己,而下令将其拘至地府。而令狐生地府归来之时,鬼差亦请其不要再作诗讽刺地府以免又得劳烦他们来拘人;《南炎浮州志》中,冥王闻儒生有才可与论道,遂请至地府与其畅谈儒学之道。最后则嘱托朴生,要求他将在南炎浮州二人的讨论传播到人间,去除荒唐不经之言。地府对令狐生的钳制和冥王对朴生传播思想的要求构成一组“反对”对话关系。《鉴湖夜泛记》中,织女因人间流传的牛郎织女之类的传奇故事有辱自己名声,便请成令言代为在人间传言翻案,以还清白名声;《醉游浮碧亭记》中,箕氏女在与洪生论诗之后,则以神力卷走所作诗赋,不欲人间传之。织女要求成令言代为传言与箕氏女不欲洪生传其诗于人间构成另一组“反对”对话关系。此外,就《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而言,《令狐生冥梦录》与《鉴湖夜泛记》、《南炎浮州志》与《醉游浮碧亭记》分别在各自文本内部又各自分别构成“反对”对话关系,阎王不欲令狐生言之与织女欲成令言传之是一组反对关系;冥王嘱朴生传大道于人间与箕氏女不欲洪生传其诗与人间是一组反对关系。文本之间和文本之中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复杂对话关系呢?这些对话关系意味着什么

7)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8页。

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进一步揭开两部小说内部隐藏的叙事结构之谜。

在古典小说中，作者一般和叙述者是合二为一的。两部小说集又都是作者抒发情感之作，因此两部小说的赞同与否定都意味着作者的赞同与否定。通过对话关系的列举，似可以推导出，即在瞿佑看来，作诗讽喻现实是有风险的，而通过传奇故事谈鬼论玄倒是难得的消遣。所以瞿佑一方面让阎王抓了作诗针砭时弊、批判地府之不公的令狐撰，另一方面又让织女请成令言去人间批判“多诈之书”“不经之语”、代自己传言，以维护他们的美好形象。而金时习则秉承文章乃千古道德之事的儒家观点，一方面认为传奇小说可以肩负起传播正言、一扫荒唐的重任，遂让冥王嘱托朴生传大道于人间；另一方面又不欲洪生传播醉后与箕氏女相与论诗之事，以免不当之语诋毁先贤之名声。而通过文本之间的对比，可以发现成令言代为传言的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织女名节之事，固然能引起人们的猎奇心理，但更多的像是一种“戏仿”，以戏谑之笔游戏文字。而朴生代为传播的则是关于世界构成、儒佛之道等相关的哲学命题，旨关宏大，发人深省。可见金时习之笔正，体现出一种推崇文字记述、“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的史家精神；瞿佑之笔戏，表现出传奇叙事走向市民阶层的通俗化倾向。

关于这一点，可以借用巴赫金对话理论进一步详加分析。巴赫金认为，“小说以社会的各种言语和在这些言语的基础上所表现的个性的多声部来演奏自己的主题及整个被描述、被表现的物质-思想世界”⁸⁾。《金螯新话》中主要体现的是传奇小说与史传叙事两种声音的对话，即《金螯新话》在传奇故事的讲述中混入了史传的叙事声音，例如前文分析的史传体结构、对于小说教化功能的发挥等，金时习在小说中处处流露出家国情怀、儒家仁政理想，体现的是一种入世士大夫话语。而《剪灯新话》中主要表现出的是传奇小说与话本叙事的两种声音的对话，即《剪灯新话》在传奇故事的讲述中表现出了传奇叙事通俗化的倾向，例如以平民为受述者的叙事结构、小说娱乐功能的发挥等，瞿佑在故事中流露出命运无常、浪迹江湖之感，体现的是一种出世

8)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24页。

士大夫话语。

值得一提的是《鉴湖夜泛记》中貌似庄严的翻案文字，其实隐含着作者的戏谑。既然那些奇怪的传奇故事不能信，还要用奇怪的传奇故事来翻案么？这更像是瞿佑玩的一个文本游戏。而《南炎浮州志》中大段的哲理性思考文字的直接引用，使得这篇小说看起来更像是原原本本照录人物文章与言行、反映人物思想的儒生传记，以致于最后金时习还要加上一个“书生将化之夕，梦神人告于四邻其将为阎罗王”的结尾，想通过这个神异的结尾表明这还是一个故事，而不是真正的史传。但是不得不说，金时习还是留了一个破绽，只说是书生梦神人告知四邻自己将为阎罗王，而缺乏四邻的直接证明，因为按照其他文章惯例，此处完全可以写成“是夜，其四邻梦神人语曰某生将为阎罗王”，由四邻自己直接陈述应该更加真实可信。大概金时习觉得这样处理，可以使该篇文章看上去是书生传奇，但当成儒生小传读也未尝不可。

综上所述，《金鳌新话》和《剪灯新话》尽管都是传奇小说集，但通过文本对话性的仔细分析，仍然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所反映的社会话语的不同。《金鳌新话》在记录奇闻时，流露出一种历史传记的面貌，在表达情感的同时，既要实录时事，又要教化人心，发挥史笔功能。而《剪灯新话》则在讲述异事时，表现出一种传奇俗化的特点，在传递情绪的同时，发挥娱乐功能。从中可以看出《金鳌新话》作为朝鲜早期的汉文小说集，在叙事中对于史传的回归；而对于《剪灯新话》而言，则是不自觉的受到话本小说及章回小说等白话通俗小说的影响。事实上，关于《剪灯新话》创作中的俗化倾向，前人已有所论述，“剪灯新话在艺术上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受话本小说的影响，描写人物的思想状况、心理活动，更细致、深刻、生动”⁹⁾。

IV. 《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叙事差异形成的原因

众所周知，明代的小说创作已经是白话小说占据主流了，瞿佑所处的元

9)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690页。

末明初更为人所知的小说其实应该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白话小说相对于文言小说而言，主要是指用当时普通人日常使用的语言进行创作、流传的作品。白话小说的源头可以溯及唐代，当时的古文运动和元白体的流行对于白话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而更大的推动来自于当时的佛教传播与变文的产生。至宋代，白话书面语成熟，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产生，标志着白话小说的生成。元代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书面语领域出现了全面口语化，元曲，尤其是散曲基本上都是口语为主。朱明代元以后，“恢复汉制”就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作文要宗秦汉，作诗要学盛唐，于是文言出现复兴局面，重新成为正宗。然而文言文脱离实际，所以尽管明朝人喊着要复古，但是这古已经没办法回去了，因为现实生活在变，人们的语言在变，所以除了复古观以外，明朝还有一种“开口见喉咙”的创作观，要求创作要言文一致。除此之外，元末明初出现了白话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也使得明代白话小说的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纵观有明一代，随着社会发展的世俗化，语言的世俗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综上所述，其实瞿佑所处的元末明初是白话迅猛发展、文言不断退出的时期，因此，可以说，尽管瞿佑遵循复古精神，使用文言文仿照唐传奇做传奇小说，但是他不能脱离时代的语言文化背景，他的叙事必然会受到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等白话小说的叙事方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

此外，随着社会的变迁，语言的变化，传奇文体自身的演变也是《剪灯新话》文体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传奇小说盛于唐世，至宋元则出现俗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传奇小说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下移，由精英文人逐渐扩展到下层文人及市民，同时传奇小说中的人物和描写也逐渐涉及普通文人及民众。这种精英文学的俗化，就像通俗文学的雅化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而最终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都获得自身的养料，得以持续发展。一种不变的文体只会走向消亡。李军均曾在《唐宋传奇小说文体研究》一文中说，“宋代传奇小说‘以俗为雅’的文体擅变，大体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语体的通俗性，二是题材的世俗性和思想情感与愿望理想的大众性，三是接受者的广泛性”¹⁰。所以在这种大的趋势下，瞿佑创作的传奇小说尽管是向唐传奇的回归，但是

不可避免的带上通俗化的印记，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相比较而言，金时习就不存在这些语言和文化背景。朝鲜半岛历来崇尚中华文明，在上层士大夫之间以汉字文言文流通，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也是以文言为主。而金时习所处的朝鲜时代，世宗大王虽颁布《训民正音》，但由于《训民正音》是为了解决“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的问题，所以当时主要将其“看作是替代吏读，以方便日常使用”¹¹⁾。尽管《训民正音》颁布后，建立了谚文厅、正音厅，但后又被废除，所以在“当时依然是汉文学占了主流”¹²⁾。另一方面，朝鲜王朝自建立就吸取了高丽灭亡的教训，从政治制度、治国思想等各个方面全面向明王朝学习，积极推行崇儒政策，不仅王室热衷于学习儒学经典，科举考试也以儒学经典为主，“自四书五经《通鉴》以上通者，以其通经多少见理精粗，第其高下，为第一场。入格者，送于礼曹，礼曹试表章古赋，为中场。试策问，为终场”¹³⁾。而金时习幼时即能背诵《中庸》《大学》，深得世宗赏识，且金时习年轻时曾在三角山苦读，有兼济天下之志，所以可以大致推断出金时习应该是非常精通于汉文创作的，更可通过其不仕于世祖朝可得知金时习的儒学立场。而此时《新罗殊异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以及假传体文学等所形成的史笔传统必然对金时习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以中国传奇小说脱胎于史传做类比的话，朝鲜汉文小说的诞生必然离不开史传滋养。

从作者的叙述动机来看，瞿佑也与金时习不尽相同。瞿佑生逢乱世，历经战乱，朱元璋统一之后，又大兴文字狱，钳制文人，封建王朝专制力度空前，思想环境较为压抑。尽管瞿佑很有才华，但一生坎坷，创作《剪灯新话》时任县训导，后于周王府长史任上因诗获罪流放外地十年，并于此期间修订

10) 李军均,《唐宋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11) (韩)李家源著,沈定昌·李俊竹译,《朝鲜文学史》(上),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371页。

12) (韩)李家源著,沈定昌·李俊竹译,《朝鲜文学史》(上),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429页。

13) 《太祖实录》,转引自:(韩)李家源著,沈定昌·李俊竹译,《朝鲜文学史》(上),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331页。

《剪灯新话》。时代氛围和亲身经历使得瞿佑的表达必须曲折而隐晦，便只能以戏笔作之，加之低级官吏身份，其叙述不可避免出现通俗化倾向。因此作品中才会有炫耀才华的传奇话语及市井平民的世俗话语。金时习尽管一生困蹇，但是其朝鲜时代精英文人的身份是肯定的。有着雄心壮志、积极入世思想的金时习在遭遇变故、隐居金鳌山进行创作之际，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他将这种苦闷诉诸笔端，同时也将自己的雄心融入进去，这样的《金鳌新话》既是传达情绪、安慰自己的文字，也是驰骋志向、抒发情怀的地方，这些因素便使得《金鳌新话》有凄美曲折的传奇故事，也有家国天下的史家意识和坚持儒学的知识分子立场。

V. 结论

《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都是传奇小说集，他们的叙事面貌从外表上看几乎一致，但是通过细读文本，分析他们的叙事结构，以及文本的对话关系，就会发现内里却是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剪灯新话》中传奇叙事的通俗化和《金鳌新话》中传奇叙事的史传化。在《剪灯新话》中，瞿佑运用游戏之笔，讲述奇闻异事，以庄重文字传达戏谑之意，尽管瞿佑自己目的在于“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并使“闻者足以戒”，但实际上的效果却并非如此。据顾炎武《日知录之馀》记载，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有如下言论，“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此语一出，《剪灯新话》遂遭禁毁。这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剪灯新话》中流露出的娱乐意味，而这种娱乐意味甚至是作者所没有意识到的，只是时代氛围的变化使然。而在《金鳌新话》中，金时习则是发出了理想被压抑时的不平之鸣，这种悲鸣虽然哀婉，却又刚健，使得小说得以借传奇故事传达历史意识。小说中流露出在儒家正统的思想和信仰受到现实政治的打击时金时习梦想的幻灭，而小说

中书生们在现实面前的卑微以及谈诗论道时的意气风发则又体现着作者的无奈与挣扎，这些情绪之间的冲突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悲壮感，这种悲壮感与小说中体现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沧桑感融为一体，不仅让金时习的文字充满力量，也让金时习的创作充满激情。这样的文字显然承载着更多的“道”，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给后人以启迪，所以金时习曾自信地说过“后世必有知我者”。至此，想必读者也更容易理解鲁迅对《剪灯新话》的那句“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的著名评语了，正是《剪灯新话》在传奇叙事中的通俗化倾向，导致其相同的传奇题材欠缺了唐人的豪迈情怀，却添加了战乱的颠沛流离和平民的烟火气息，故给人以“冗弱”的感觉；而《金鳌新话》中传奇叙事中的史传笔法赋予了《金鳌新话》一种民族上升期文学的“锐气和朝气”，将民族历史、哲理思考化入传奇故事里，以史诗般的悲剧意识和家国情怀加速了朝鲜民族精神的形成，所以金台俊认为《金鳌新话》“最充分的发挥了乡土气息，表现了民族自主精神”。

< References >

1. Dong Naibin(ed.). *Traditional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ry Narrativ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2. Dong Xiaoying. *Re-Babylon Tower: Bakhtin's Theory of Dialogue*, Beijing: Life, Reading, Shinnichi Joint Publishing Co., 1994.
3. Jin Yingjin. *Brief History of Korean Literature*,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Kim, Jeong-yug. “‘Keumo shinwha’ and ‘Jeondeung shinwha’ comparative research”. *Xiame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Journal* 1, 2004.
5. Kim, Taejoon(Writing), Quan Huamin(Translation). *Korea novel history*.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2008.
6. Lee, Gawon(Writing). Shen Dingchang & Li Junzhu(Translation),

- Korean literature history* (Vol.1). Hong Kong: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Press Ltd., 2005.
7. Li Junjun. *Tang and Song Legendary Novel Style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04.
 8. Li Gui Kui. *Narrative Comparison between Legendary novel and Storybook Novel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9. Lin Mingde(ed.). *Complete Works of Korean Chinese Fiction* (Vol.3, 7). Seoul: Sinology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1999.
 10. Ma Zhenfang. "On the impact of ancient vernacular novels on the legendary forms of classical Chinese".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6.
 11. Meng Zhaolian. *History of Vernacular Fiction*.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 Qu You et al., Zhou Lengjia(School notes), Choi Yongchul(Trans.). *Three books of cutting candle romance* (Vol.1), Seoul: Somum Press, 2005.
 13. Wu Zhida,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 Jinan: Qilu Publishing House, 1994.
 14. Zhang Zheju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参考文献>

1. 董乃斌主编, 《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 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 巴赫金与对话理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3. 金英今编著, 《韩国文学简史》,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4. (韩)金政六, 〈《金鳌新话》和《剪灯新话》比较考〉,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 2004.
5. (韩)金台俊著, 全华民译, 《朝鲜小说史》,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6. (韩)李家源著, 沈定昌·李俊竹译, 《朝鲜文学史》(上), 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5.
7. 李军均, 〈唐宋传奇小说文体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4.
8. 李桂奎, 《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9. 林明德 主编, 《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三卷、七卷), 首尔, 国学资料院, 1999.
10. 马振方, 〈论古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2006年.
11. 孟昭连, 《白话小说生成史》,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
12. 瞿佑等著, 周楞伽校注, 崔溶澈译注, 《剪灯三种》(上), 首尔, 소명출판, 2005.
13. 吴志达, 《中国文言小说史》, 济南, 齐鲁书社, 1994.9.
14. 张哲俊, 《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Abstract >

After the birth of “Jeondeung shinhwa” and “Keumo shinwha”, respectively,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novels. They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s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refore,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rrative traditions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Jeondeung shinhwa” legendary narrative,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calligraphic novels and so on are reflected, which reflects the popularization tendency of the classical novel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lassical novels to open up the barriers of the classical narration and the vernacular narration. In the “Keumo shinwha” legendary narration, it actively display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historical genres, embodies the reliance on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ovels in the Joseon era, and this strategy has accelerat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literary spirit in the Joseon Dynasty.

Key Words : 《剪灯新话》(“Jeondeung shinhwa”), 《金鰲新话》(“Keumo shinwha”), 叙事比较(Narrative comparison)